

贵州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探析

张薇¹ 俞凯²

(1. 中共安顺市委党校, 贵州 安顺 561000; 2. 安顺学院, 贵州 安顺 561000)

【摘要】移民搬迁后的发展问题才是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关键, 搬迁是手段, 永续脱贫实现致富才是搬迁的目的和使命。所以如何做好搬迁“后半篇文章”的相关领域亟需探讨, 为提出后续扶持保障工作的建议和实施思路, 对易地搬迁后的工作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生态移民内涵、党的建设、可持续生计、文化建设、移民社会适应和后续措施六个方面探析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理论。

【关键词】贵州; 易地扶贫搬迁; 理论

总书记指出“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改善人居环境, 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2015年12月, 贵州省率先在全国打响易地扶贫搬迁“第一炮”, 启动了贵州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生态移民群体。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和搬迁工作的逐步完成, 贵州省出台“五个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意见》, 随着贵州实现全部脱贫, 如何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成为重要课题。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在国内外形成了一系列观点, 主要有:

一、关于生态移民内涵方面的研究

生态移民研究的开端是美国的科学家提出“生态群落迁移”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Lester Brown首次提出“环境难民”的概念。1985年, 联合国环境署研究院的Essam EL-Hinnawi对这一概念做了界定: 环境难民是“由于显著的环境崩溃导致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甚至生存受到威胁, 从而不得不选择迁移的人”。Luisa Veronis (2014) 提出环境是促成移民搬迁的重要因素; David J. Wrathall (2016) 探讨了环境压力对劳动力迁移的作用机制; Seda Erkan (2017) 认为随着地势和距离的增加, 农村人口流动也在增加。总的来说, 学者们关注的是生态问题导致的被迫迁移的移民。经过长期跟踪研究发现, 移民搬迁到新的地方后会遇到各种问题, 生态移民搬迁可能导致移民失业和收入降低而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生态移民过程极其复杂, 难以衡量计算移民的得失。阿达姆斯认为生态移民搬迁使人类与自然相互隔离, 造成人与自然的两重断裂。克鲁等学者也关注了移民的

文化变迁问题, 认为搬迁可能导致移民群体的文化断裂而产生诸多社会问题。

“移民搬迁”的现象我国很早就已经出现。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在生态移民的定义、政策、机制、性质和安置方式等方面, 后来逐渐延伸到社会适应、迁移意愿、困境因素等方面。本研究主要是搬迁移民即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 所以从适应性方面来看, “生态移民”的概念首次被国内文献提及是在任耀武、袁国宝和季风瑚 (1993) 共同撰写的《试论三峡库区生态移民》中。王放和王益谦 (2003) 指出: 生态移民 (eco-migration) 也称环境移民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系指原居住在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地区、生态脆弱区以及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区的人口, 搬离原来的居住地, 在另外的地方定居并重建家园的人口迁移。而依此实施的工作即为生态移民工程 (易地扶贫搬迁)。2006年《易地扶贫搬迁“十一五”规划》出台并指出, “易地扶贫搬迁, 亦称生态移民, 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探索实施的一项重要扶贫举措, 通过对生活在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贫困人口实施搬迁, 达到消除贫困和改善生态的双重目标”。将“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移民”上升到一个高度, 随之孕育而出的“移民搬迁”、“易地移民搬迁”等不同的称呼, 变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关于扶贫问题的解决政策和方案。之后皮海峰 (2004)、智明 (2006)、梁福庆 (2011) 和张铁军 (2012) 等学者对生态移民进行了定义和分类。

二、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后党的建设方面的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要坚持党建引领, 加强安置点党的建设是优化社区治理的重要环节。何得桂等

(2019)认为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搬迁社区治理体制是推进搬迁社区“治理有效”关键一环,主张通过强化搬迁社区党建引领机制、明确搬迁社区自治单元边界、压实支部书记第一责任机制来加强社区党建。贵州赫章为做好易地扶持搬迁“后半篇文章”探索推行“党建+积分”模式。

三、关于易地扶持搬迁后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

可持续生计是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WCED)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认为消除贫困的最终表现是稳定的生计。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可持续生计方法成为解决贫困的发展路径,实现稳定生计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方法。此后,各国在研究扶持时可持续生计被广泛应用,并形成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其中影响最大、应用最广的是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搬迁后移民生计问题直接影响搬迁移民的生活水平,是移民“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是搬迁后的首要问题。易静(2015)等对武陵源移民户和非移民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居民的生计影响最大。赵焯誉(2017)构建了易地扶贫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评价的指标体系。周强(2020)以贵州民族地区搬迁后的生计问题为议题,对生计资本的三种情况加以分析,认为生计资本的变动是影响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朱慧慧(2021)从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分析东平县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减贫效应。

四、关于易地扶持搬迁后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

桑才让(2011)强调重建移民的精神家园,帮助他们缓解由文化不适应带来的震荡和心理压力,以及提升移民文化,融入城市文化元素以增强适应能力。文化建设是搬迁群众后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杨萍(2013)提出要通过适当措施提高移民的语言交流能力和文化水平,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谭清(2020)指出在易地扶持搬迁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民族村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张兰(2020)提出搬迁不仅是人的迁移,更多是文化的搬迁,搬迁户对迁出地所作出的文化适应是搬迁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总之,学者们发现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变化了,文化也会随之发生变迁,要加强搬迁后的文化建设。

五、关于易地扶持搬迁后移民社会适应方面的研究

易地扶持搬迁后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

搬迁群众能否较好的适应迁入地生活。董苾茜基于宁夏沐恩社区的调研表明,生产生活空间的变更容易导致移民陷入社会适应困境,表现为生计不适应、社交适应困境以及行为规范适应困境。韦仁忠(2013)认为要重建、发展社会组织,让新的组织来协调整合移民的各种关系,组织各种活动让移民与安置点居民多接触、交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等。李培林和王晓毅(2013)提出提高移民的生存技能。柳劲松(2017)在研究武陵山片区生态移民的技术培训进行研究后发现,“供需匹配度、流程组织、制度资金保障、目标与效率和外部环境”是影响生态移民技能培训服务绩效的五个关键因素。而当前的技术培训绩效不足,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学者专门研究老年人和移民子女的适应情况,研究提升搬迁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张玉凤,2019)和更好地解决移民子女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问题(包静慧,2021)。学者们认为要扩展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

六、关于易地扶持搬迁后续措施方面的研究

宁静(2018)提出国家应加强后续帮扶的配套措施,如后续的产业政策和技能培训、就业安置等。刘明月(2019)强调要改进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对搬迁户实行差异化的帮扶政策,加大对搬迁农户的人力资本投入。郑瑞强(2015)认为在扶贫移民社会适应期,需要更新观念,开拓移民视野;强化技能培训,注重产业发展;梳理区域政策,推进不同层次发展政策对接;强化移民专业经济组织建设,落实政策承接。

总的来说,国外对生态移民的研究相对较早,而且内涵更为丰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国内研究看来,伴随着我国从易地扶贫搬迁到易地扶持搬迁的发展和延伸,这个领域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目前较为丰富。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人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研究的内容也不断丰富,从原来的概念、类型、安置方式、目标等到社会得适应等各个层面。研究的方法从理论研究过渡到理论与实地调查结合的基础上,成果不断丰富,可信度高。目前关于易地扶持搬迁“后半篇文章”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内容上,更多在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和适应性,易地扶持搬迁的适应性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适应性也是某一层面,比如经济方面的适应或者文化方面的适应等,系统。全面的综合社会适应研究缺乏;二是

研究对象上,范围较窄,大多数是一个移民点或者一个小的地区进行研究,大区域大规模之间的比较研究缺乏。研究的整体性不强,有零碎的现状,对某一大的区域或者某一类型有整体全面的了解;三是研究方法上,目前更多的定性研究和简单的定量研究,是对某一个移民点或一个小的区域进行观察、访谈或发放问卷的方式,目前缺乏运用多元统计方法来研究易地扶持搬迁。

因此本文以贵州省易地扶持搬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贵州地区易地扶持搬迁的理论探析,总结发现易地搬迁后各项工作中的成效和问题,系统评价易地扶持搬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梳理其模式和途径,构建后续发展路径,补充贵州省易地扶持搬迁研究的理论基础,丰富理论体系,为实现易地扶持搬迁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中,搬出是最浅的层次,也是最容易完成的。稳住、致富这两者显然层次更高,任务更为艰巨,是着实的“硬骨头”。其实,稳住、致富都是在解决易地扶持搬迁后续发展问题,从理论层面而言,也就是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实现脱贫后易地扶持搬迁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口迁移,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交往习惯等都会有所变化,因此必然面临现实风险。易地扶持搬迁面临的首要风险是移民的返贫风险,不论是远迁还是近迁,移民都要面临离开熟悉的居住环境、重新建构生存环境的过程。移民很可能因为原有的生产经验、生活习俗不适用,社交网络被打破等因素产生适应困境和发展困境,甚至发生返贫,正是这些风险的存在使得易地扶持搬迁后续扶持尤为必要。

易扶持搬迁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社会建构过程,保证搬迁移民脱贫可持续是关键。拟根据前六部分的分析,看出易地扶持搬迁要以党建为引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增强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性、提升移民自身能力和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等。

参考文献:

- [1] 何玲玲、吕翠丽.易地扶贫搬迁与搬迁人口市民化耦合研究: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实践表述[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年8月1日.
-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年度报告(2018)[M].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 [3] 金莲、王永平、黄海燕.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研的大数据[M].中国科学出版社2021年5月.
- [4] 吴晓萍、刘辉武.西南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M].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
- [5] 王放、王益谦.论生态移民与长江上游可持续发展[J].《人口与经济》2003年第4期.
- [6] 包智明.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及若干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 [7] 梁福庆.中国生态移民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 [8] 何得桂、徐榕、张旭亮.乡村振兴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及其深化[J].行政科学论坛,2019年第2期.
- [9] 张铁军.生态移民社会适应问题研究[J].理论建设,2012年第3期.
- [10] 周强、黄臻、张玮.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民族地区扶贫搬迁农户后续生计问题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20,41(07).
- [11] 朱慧慧.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东平县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减贫效应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21年.
- [12] 赵烨蓉.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以山西省宁武县为例[D].山西大学,2017年.
- [13] 易静.世界遗产地生态移民户生计方式变迁研究:武陵源案例[D].湖南师范大学,2015年.
- [14] 谭清.易地扶贫搬迁中的民族村落文化变迁研究——以恩施州杨家坡村为例[D].湖北民族大学,2020年.
- [15] 张兰.重构家园:易地搬迁的文化反思——以凤凰县禾库镇易地扶贫搬迁为例[D].首吉大学,2020年.
- [16] 张玉凤.社会适应视阈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研究——以贵州省惠水县M小学为例[D].贵州师范大学,2019年.
- [17] Henry Chandler Cowles,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 of the Vegetation of the Sand Dunes of Lake Michigan", Adopted from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Micropedia, Volume III, Ready Reference and Index,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899.
- [18] Lester Brown, McGrath Patricia and Bruce Stokes, "Twenty - Two Dimensions of the Population Problem", Worldwatch Institution Worldwatch Paper 5, 1916.